

## 民族交融与文本书写

——以道童事迹及《元史·道童传》为案例

尚衍斌 封 渊

本文发掘元明时期的碑刻和地方志资料,就《元史·道童传》传主道童的出身、族别、宦迹等问题进行考述,认为道童并非高昌人,而是蒙古“太师国王木华黎”的第七世孙。道童曾为官汉地,出仕江南,是一位具有较高汉文化水平的蒙古儒臣。通过对《道童传》及相关文本的讨论,展示民族交流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图景。

关键词:道童 《元史》 蒙古 高昌 元朝

作者尚衍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封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地址:北京市,邮编 100081。

元朝的大一统促进了民族交流与文化融合。随着民族间的混居与交融,民族意识渐趋淡薄,反映在文本书写中,有关族属与来源等民族特征的记述往往模糊或错讹,甚至不乏想象的成分。元代文献中道童所谓“高昌人”说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元史·道童传》对传主的家世及其早期任职情况语焉不详。尽管柯劭忞(1848—1933)在编修《新元史》时,对《元史·道童传》多所补苴,<sup>①</sup>可惜未能穷尽文献、辨析史料,故而难以使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本文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元明时期的碑刻和地方志资料,拟就道童的出身、族别、宦迹等相关问题做精细考辨,以此对《元史·道童传》的相关内容略事补正。

### 一、元代文献中五道童辨

笔者翻检元、明传世文献时发现,名为“道童”或“道同”者共五人。一是《元史》本传中的高昌道童;<sup>②</sup>二是元统元年(1333)癸酉科右榜进士道同,字文卿,别十八里畏兀儿氏,曾任将仕郎、江州路录事司达鲁花赤;<sup>③</sup>三是至正年间出任江东廉访使的道童;<sup>④</sup>四是木华黎后裔,即蒙

① 柯劭忞:《新元史》卷215《道童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45页。

② 《元史》卷144《道童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42—3444页。

③ 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台北文盛彩艺事业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69—70页。

④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道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202页。

古人道童；<sup>①</sup>五是揭傒斯(1274—1344)《寄题湖广平章道童归耕亭》诗中提及的道童。<sup>②</sup>

在以上五人中,尽管第一人和第二人都出自西域,但并不是同一个人。因为《元史》中的道童号“石岩”,未书字,以“世胄入官”。<sup>③</sup>而后者,其曾祖八扎赤除了担任“宣授管领畏兀儿官”以外,他的祖父小哥和父亲肃安则分别出任过中、低级官员。<sup>④</sup>显然,他与《元史·道童传》主人公的家族背景不甚契合。

至于第三人,即至正十年(1350)出任江东廉访使的道童,是唐兀人,字德章,自号贺兰逸人。钱大昕明确指出其人与《元史·道童传》传主亦非同一人。<sup>⑤</sup>

第四位道童,见于《元史·木华黎传》,是蒙古名臣木华黎的第七世孙,宝哥之子。<sup>⑥</sup>

至于揭傒斯笔下的“湖广平章道童”,事迹不详。其诗云:

世臣与国同休戚,上相明农戒满盈。种就园林皆已趣,凿来沟洫任人耕。一门忠孝谁能及,四世侯王不是荣。海内只今多盗贼,未应畎亩独闲情。<sup>⑦</sup>

上引诗题中的“湖广平章道童”出身“世臣”望族,且担任过湖广平章政事。此人的身世似乎与《元史》中道童的家庭背景有些相似,但仔细辨析史料不难发现,后者不仅缺少出任湖广平章政事的经历,而且任职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大都(今北京)、江西、浙江等地,所以两者亦非同一个人。由“世臣与国同休戚”、“四世侯王不是荣”等诗句不难看出,揭傒斯笔下的道童的确出自官宦世家,一门四世封王,恐怕在当时并不多见。笔者翻检史籍发现,在元代累世封王,其后裔又名为道童者,乃黄溍笔下的哈刺鲁氏柏铁木儿家族。至于柏铁木儿(1287—1326)其人,《元史》有传。该家族在其高祖塔不台带领下迁至漠北高原的斡难河(今鄂嫩河)畔,后来随成吉思汗东征西讨,屡建战功,深受倚重。

柏铁木儿的父亲曲枢,因“佐仁宗平内难,迎武宗即皇帝位”,被封为应国公。元仁宗还颁布诏命,推恩其三代,高祖塔不台、曾祖阿达台、祖质理华台三人皆被追封为祁连王,而曲枢本人后来也被追封为广阳王。柏铁木儿历仕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四朝,“武宗之入正大统,王(柏铁木儿——引者注)之功居多”。仁宗继位后,被委以侍御史,去世后被追封为文安王,柏铁木儿的叔父秃忽赤,因子贵追封为安成王,其兄伯都官至中书右丞,逝世后追封为赵国公。柏铁木儿家族,一门五世王侯,封王、拜国公者多达七人,可谓满门显宦,甚受亲重。曲枢患病去世后,族人欲守本俗,柏铁木儿劝曰:“今居乎中国,独不可行先王之礼乎?”于是“躬衰絰,居倚庐,哭踊以节,荐奠以时。后居内忧,亦如之,遂世守为家范”。<sup>⑧</sup>可谓忠、孝两全。此与“一门忠孝谁能及,四世侯王不是荣”的诗句相互印证,足可信据。据黄溍《太傅文安忠宪王家传》,道童是柏铁木儿与其高丽妻子所生的第二个儿子,任右藏库提点(从五品)。藉此可以断定,揭傒斯笔下的“湖广平章道童”与黄溍笔下的道童(哈刺鲁氏)是同一个人,应有别于《元史·道童传》的传主。

① 《元史》卷119《木华黎传》,第2940页。

② (元)揭傒斯:《揭傒斯全集》卷4《寄题湖广平章道童归耕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132页。

③ 《元史》卷144《道童传》,第3442页。

④ (清)钱大昕:《元史氏族表》卷2《色目》,《嘉定钱大昕全集》(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沈仁国:《元朝进士集证》(下册),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69页。

⑤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道童》,第201—202页。

⑥ 《元史》卷119《木华黎传》,第2929—2940页。

⑦ (元)揭傒斯:《揭傒斯全集》卷4《寄题湖广平章道童归耕亭》,第131—132页。

⑧ (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太傅文安忠宪王家传》,《四部丛刊》初编本,第449页。

## 二、《元史·道童传》传主事履钩沉

关于《元史·道童传》传主早期的任职情况,编撰者仅寥寥数笔,使读者难以明了其家世与族别情况。而被收入《侨吴集》的《去思碑》对道童出任平江路总管之前的任职情况记述不多,仅言:“公世系出高昌望族,由僦直殿省,初命宣授承直郎、中书省舍人,一再为监察御史,比三金广东山南廉访司事,及今之为平江也,凡十有三命于朝矣。”<sup>①</sup>这段史料较清楚地介绍了道童早期的任职经历,弥补了《元史·道童传》记载过于简略的缺憾。

据《元史·道童传》和《元史·宰相年表》,至正元年,道童出任大都路达鲁花赤,后转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至正七年三月,擢中书省参知政事;<sup>②</sup>八年(1348)冬,担任江浙行省右丞,不久升任本省平章政事,至正十一年迁转江西行省平章政事。<sup>③</sup>道童以上任职经历得到成化《杭州府志·名宦传》以及嘉靖《浙江通志·官师志》的证实,<sup>④</sup>足可信据。道童在担任江浙行省右丞期间,曾敦请儒僧雪窗复出,重新主持平江承天能仁寺。<sup>⑤</sup>

综上不难看出,至正七年,道童出任中书宰执,官位显赫。从至正八年至至正十一年间,他主要在江浙行省任职。周伯琦(1298—1369)有一首诗,题为《还至钱塘浙省开宴湖山堂泛湖而归纪事三十韵简道同平章诸公》<sup>⑥</sup>亦能佐证。诗云:“相国秉周礼,张宴欲罄欢。款言劳行李,远自青云端……主赋皇华诗,谏度道里难。宾奉甘棠咏,南国磐石安。”这首诗应作于至正八年三月。其时,周伯琦奉命从广东道肃政廉访司佥事任上北拜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一职,途经杭州时受到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道童的盛情款待,遂吟诵此诗表达谢意。周伯琦诗题中的“道同”,与《元史·道童传》主人公的名字读音相同,且职衔及任职时间同,应是同一个人。至正八年前后,因其出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遂有“道同平章”之称谓。

清人顾嗣立、席世臣编《元诗选癸集》收录了道童的《送都元帅述律杰云南开阡》一诗,编者在“道童小传”中称:“道童字□□,□□人。官太常礼仪院佥事。”<sup>⑦</sup>太常礼仪院,主要负责掌管大礼乐、祭祀宗庙社稷、封赠谥号等事宜。那么,道童是否真的担任过太常礼仪院佥事?所幸的是,我们可以从周伯琦的诗句中找到答案。其诗曰:“十年尘禁从,一朝摄祠官。”前句与《去思碑》中的“僦直殿省”相互印证,说明道童具有出身怯薛的经历。后句中的“祠官”,则指掌管祭祀或祠庙的官员。如此看来,顾嗣立必有所据。至于道童何时担任“祠官”,史无明文,无从查证。

道童其他任职经历,洪武《苏州府志》卷20《牧守题名》亦多所记载:“道童,通议大夫,(后)

① (元)郑元祐:《郑元祐集》卷11《前平江路总管道童公去思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页。

② 《元史》卷113《宰相年表二》,第2849页。

③ 《元史》卷144《道童传》,第3442页。

④ 嘉靖《浙江通志》卷33《官师志·道童传》,《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据明嘉靖四十年刻本影印,第629—630页;成化《杭州府志》卷37《名宦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5册,据南京图书馆藏明成化十一年刻本影印,第525页。

⑤ (明)钱穀:《吴郡文粹续集》卷29《平江承天能仁寺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7页。

⑥ (元)周伯琦:《还至钱塘浙省开宴湖山堂泛湖而归纪事三十韵简道同平章诸公》,参见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0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84页。

⑦ (清)顾嗣立、席世臣:《元诗选癸集》(上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33页。

至元二年到任,改除江淮财赋都总管府达鲁花赤。”<sup>①</sup>同书卷26《名宦传》亦称:道童,高昌人,自号石岩,“由承直郎、中书舍人累迁州达鲁花赤,拜监察御史,历廉访僉事。后至元二年,自信州总管转通议大夫、平江路总管”。<sup>②</sup>那么,道童究竟在哪个州担任达鲁花赤?弘治《重修无锡县志》卷11《宦绩》记载说:“道童,蒙古人。延祐五年,由中书省舍人迁本州达鲁花赤,在任恩威著明,作厅壁记,刻石尚存,历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封司徒,自号石岩,《元史》有传。”<sup>③</sup>康熙《无锡县志》卷16《遗爱》篇谓:“道童,蒙古人,自号石岩,以世胄入官,由中书舍人迁本州达鲁花赤,沉毅寡言,有威惠。后官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陈有(友)谅攻江西,(道)童与火尔赤不相能,城且陷……谥忠烈。”<sup>④</sup>

结合以上史文,我们就《去思碑》有关道童“及今之为平江也,凡十有三命于朝”的记述略加阐释。在出任平江路总管之前,道童最初担任东阿县达鲁花赤,后为怯薛,再由怯薛拔擢为宣授承直郎、中书直省舍人,再后迁转无锡州达鲁花赤,而并非如《去思碑》所言“一再为监察御史”。离任无锡州之后,道童官拜太常礼仪院僉事。也就是说,道童在履县达鲁花赤、怯薛、中书直省舍人、州达鲁花赤以后,才被任命为“祠官”。后来,转任监察御史。元代由太常礼仪院官员转任监察御史者不在少数,别儿怯不花由同知太常礼仪院事拜监察御史;巉巉亦由同知太常礼仪院事拜监察御史;唐兀人福寿由僉太常礼仪院事拜监察御史;唐兀吾密氏卜颜铁木儿则由太常署丞拜监察御史。<sup>⑤</sup>据此不难判断,道童等元代官员从太常礼仪院僉事转任监察御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道童由监察御史出任廉访司事,也属于元代官员升迁的正常途径。<sup>⑥</sup>其后,又由通议大夫、信州路总管迁转通议大夫、平江路总管。

由以上考述不难看出,道童先后在不同的机构任职九次,如果再加上两次授予的散官称衔,共计十一次,此距《去思碑》所谓“十有三命于朝”还差“二命”。笔者认为,这十三次任命的职务分别是县达鲁花赤(中县,正七品)、州达鲁花赤(中州,正五品)、太常礼仪院僉事(从三品)、监察御史(正七品)、廉访司僉事(正五品)。由于信州路总管与平江路总管的官阶和品秩相同,而失载的两次散官职衔又均为通议大夫,所以路总管和通议大夫分别计算一次。至此,道童被朝廷十三次委以重任的任职经历大致得以复原。

道童在江浙行省任职的时间最长、任职岗位最多。江浙一带是财富聚集之地,也是元代政权得以赓续的经济来源。道童在平江路任职期间,该地“民气破伤,重以贪残侵牟,费出无艺。旧号兼并而以财雄吴天下者,数年来困于诛求,殫于掊剥,至荡析奔溃,父子兄弟不相保”。为了振兴当地经济,道童不仅派属核查民众实际拥有的土地数量,而且在平江征收夏丝二万一千余斤,以确保朝廷赋税征收的数量。据《去思碑》记载,道童“持身严,烛理明,决事敏,待人

① 洪武《苏州府志》卷20《牧守题名》,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影印洪武十二年抄本,《中国方志丛书》第432册,第802页。

② 洪武《苏州府志》卷26《名宦》,第1070—1072页。

③ 弘治《重修无锡县志》卷11《职官三·宦绩》,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影印弘治七年刻本,《无锡文库》第1辑,第153页。

④ 康熙《无锡县志》卷16《遗爱》,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影印康熙二十九年刻本,《无锡文库》第1辑,第212—212页。

⑤ 《元史》卷140《别儿怯不花传》,第3365页;《元史》卷143《巉巉传》,第3413页;《元史》卷144《福寿传》,第3441页;《元史》卷144《卜颜铁木儿传》,第3436页。

⑥ (元)许有壬:《至正集》卷74《铨除御史》,《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7册,第337页。

直”。当平江路遭遇旱灾时,他“宿公署,屏酒肉,恐惧修省,祈哀百神”,<sup>①</sup>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履职良知。平江虽是富庶之地,道童却一无所取,以至于家“无方田以耕,无区宅以居”。当他离开平江时,当地民众为了铭记他在“凶岁”年景中的付出与治迹,特委托耆老持书状前往宁国请汪泽民为其撰述《去思碑》。<sup>②</sup>

### 三、《元史·道童传》传主即木华黎后裔

关于道童的族属,《元史·道童传》明言:“道童,高昌人,自号石岩。”<sup>③</sup>成化《杭州府志·名宦传》、正德《姑苏志·宦迹》和嘉靖《浙江通志·官师志》都沿袭此说,将道童视作高昌人。清人钱大昕(1728—1804)在编制《元史氏族表》时也把道童记作高昌人。<sup>④</sup>那么,道童真的是高昌人吗?其实持不同见解的史料并不少见,诸如明弘治《重修无锡县志》、《书史会要》、清康熙《无锡县志》等分别将其记载为蒙古人。二者孰是孰非?值得深究。弘治《重修无锡县志》收录的“厅壁记”是道童在该地任职时所作,这一点得到同书卷35《碑碣》的佐证,内称:“□厅壁记,至治元年达鲁花赤道童撰。”原文脱漏之字,疑为“州”字。结合“厅壁记”内容通盘考虑,此道童与《元史·道童传》传主无疑是指同一个人,其自署蒙古人不应有误。<sup>⑤</sup>

此外,苏天爵(1294—1352)所撰《书孔子及颜子以下七十二贤像》对于考察道童的家世和族属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为了便于分析,现援引如下:

古先圣及颜子以下七十二贤像,江浙行省平章荣禄公所藏也。公以太师国王诸孙践扬台、省,允著材能,暇则好收法书秘画,尤喜古圣贤像。当圣朝龙兴之初,国王以征伐有大勋烈,受封食邑于东平。凡郡邑之长,悉听其宗族子孙及部人为之。东平密迩邹、鲁,圣贤之教所由兴也,故其人官于斯家于斯者,则有好贤乐善之心焉。平章初监东阿,进擢朝著,适际国家文明之治,宜其所好异于人也。天爵少读孔氏书,见圣人居乡党,在宗庙、朝廷,动容周旋,无不中礼。门人熟视而详录之,宛然如圣人之在目也。况览观图像,思慕言动,其必有所感而兴起矣夫。至正己丑三月甲子,学者苏天爵拜手谨记。<sup>⑥</sup>

苏天爵笔下这位喜好收藏法书、秘画,且身为蒙元开国名臣、太师国王木华黎后裔的“江浙行省平章荣禄公”究竟是何人?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苏天爵这篇题记作于至正己丑(九年)三月甲子(即公元1349年4月21日)。是年,苏天爵在江浙行省担任参知政事,与道童在同一个地方任职。<sup>⑦</sup>依据《元史·道童传》、《元史·宰相年表》、嘉靖《浙江通志·官师志》、黄潜《平江承天能仁寺记》以及前引周伯琦的诗作可以断定,道童至晚在至正八年已出任江浙行省右丞,不久转任该省平章政事,并于至正十一年出任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道童的任职时间和职衔恰与苏氏笔下这位“江浙行省平

① (元)郑元祐:《郑元祐集》卷11《前平江路总管道童公去思碑》,第264页。

② 被收入《侨吴集》的《前平江路总管道童公去思碑》并非郑元祐撰著,而是出自汪泽民之手,容另文详述。

③ 《元史》卷144《道童传》,第3442页。

④ (清)钱大昕:《元史氏族表》卷2《色目》,《嘉定钱大昕全集》(第5册),第173页。

⑤ 弘治《重修无锡县志》卷35《碑碣》,第316页。

⑥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30《书孔子及颜子以下七十二贤像》,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10页。

⑦ 苏天爵在《曹先生文稿序》中称:“至正己丑春正月丙午,通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赵郡苏天爵序。”同作者又在《书泰定廷试策题稿后》中言:“至正己丑六月甲戌,通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赵郡苏天爵书。”(参见《滋溪文稿》卷6、卷30,第85、512页)至正己丑,即至正九年。是年正月至六月,苏天爵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此时道童则担任江浙行省右丞或平章政事,故两人为同僚。

章荣禄公”相符。

其次,上引题记称:“平章初监东阿,进擢朝著,适际国家文明之治,宜其所好异于人也。”所谓“进擢朝著”,与前文所述道童进入朝野后被拔擢为中书舍人的经历相似,而中书(直)省舍人一职则是出身怯薛者步入朝堂的重要通道之一,这一点从道童本人后来发出的感叹可以得到验证:“我为元朝大臣,官至极品,今城陷不守,尚何面目复见人乎!”<sup>①</sup>而“践扬台、省,允著材能”之谓,或与道童分别出任监察御史、广东山南廉访司佥事以及中书参知政事的经历十分吻合。如此看来,“江浙行省平章荣禄公”与《元史·道童传》主人公的任职经历大致契合。

再次,题记称江浙行省平章荣禄公“暇则好收法书、秘画,尤喜古圣贤像”,道童则“尤工大字,能作双钩书”,<sup>②</sup>“尝喜大字书”。<sup>③</sup>这一点从朱德润(1294—1365)的《石岩参政山水图赞》亦略知一二,山水图应出自“石岩参政”之手,“石岩”与“参政”分别是道童的自号和称衔,朱德润尊称道童为“道公”,并称赞其画作“千载丹青,用垂令名”。<sup>④</sup>由此可见,江浙行省平章荣禄公与道童都擅长书法,喜欢收藏秘画,他们应是同一个人。

复次,题记曰:江浙行省平章荣禄公“以太师国王诸孙践扬台、省,允著材能”,“当圣朝龙兴之初,国王以征伐有大勋烈,受封食邑于东平”。这里的“太师国王”,指大蒙古国开国功臣,札剌亦儿部人木华黎(1170—1223)及其后裔,世代为蒙古孛儿只斤贵族的臣仆。据《元朝名臣事略·太师鲁国忠武王木华黎》和《元史·木华黎传》,早在元太祖十二年(1217),成吉思汗即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并赐誓券黄金印,文曰:“子孙传国,世世无绝。”<sup>⑤</sup>而东平则是木华黎家族的食邑所在地,木华黎长孙塔思(1212—1239)在东平获得可控制的在籍人户约39019户。其次孙速浑察和霸都鲁(?—1261)在元中后期亦分别被追封为东平王。

笔者查检木华黎后人传记发现,的确有一位名叫道童的人出自塔思一支。木华黎之子孛鲁(1197—1228)共有七子,塔思为长子,即木华黎长孙。道童的曾祖忽都华、祖父忽都帖木儿、父宝哥及道童皆承袭“国王”封爵。<sup>⑥</sup>从木华黎算起,历经孛鲁、塔思、硕笃儿、忽都华、忽都帖木儿、宝哥六代,到道童恰好为第七代,如此看来,在至正八年前后出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道童应是蒙古名臣木华黎的第七世孙。对此,萧启庆也持同样的见解,称:“木华黎子孙袭国王之号共十二人,凡十四传。而木华黎的后裔除了拥有‘国王’称衔外,其孙塔思的后裔还获得比照国王的待遇。这一王位以后共袭传四代四人,直至木华黎的第七世孙道童。”<sup>⑦</sup>

除《元史·木华黎传》和苏天爵明言道童是“太师国王”的后人外,明人唐桂芳(1308—1381)所撰《为善堂记》也提供些许有价值的信息,内称:“‘为善最乐’者,东平王四字符也。‘为善’者,前石岩平章公二字符也。平章尝为广信太守,得郡从事之贤,曰吴公万里,为人侃侃,好善不怠,大书以宠异之。”又云:“石岩,则道童公号也。”<sup>⑧</sup>这篇《为善堂记》是唐桂芳应道童的同事吴万里后人之请而作,唐氏称:“为善最乐”四字是东平王所书,“为善”二字,则是“石岩平章公”

① 《元史》卷144《道童传》,第3444页。

②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7《大元·道童条》,上海书店1984年据武进陶氏逸园景刊明洪武本影印,第338页。

③ 洪武《苏州府志》卷26《人物·名宦》,第1072页。

④ (元)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7《石岩参政山水图赞》,《四部丛刊》续编本。

⑤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太师鲁国忠武王》,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页。

⑥ 《元史》卷119《木华黎传》,第2940页。

⑦ 萧启庆:《元代四大蒙古家族》,《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67页。

⑧ (明)唐桂芳:《白云文稿》卷19《为善堂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5册,第660页。

(即道童)书写。唐桂芳显然将“东平王”与“石岩平章”误认为是两个人,此与其不谙道童家世及祖上受封情况有关。其实,“为善最乐”一语最早出自东汉东平宪王刘苍之口。《后汉书》载曰:“东平宪王苍,建武十五年封东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sup>①</sup>很显然,唐桂芳笔下的“东平王”并非指东汉的“东平宪王苍”,结合其“大书以宠异之”的记载,“东平”应指木华黎家族的食邑所在地,以此代指道童。

通过以上考察,可见《元史·道童传》传主即苏天爵笔下的“江浙行省平章荣禄公”,与《元史·木华黎传》中木华黎七世孙道童为同一人;《道童传》称其为高昌人显系错误。苏天爵是元朝著名文史专家,长期在中央任职,又身为馆阁名臣,在江浙行省任上与道童有同僚之谊,其活动年代又与道童相同,因此江浙行省平章荣禄公(指道童)出自蒙古札剌儿氏的记述是可以信据的。此外,道童为蒙古名臣的说法还得到江西名儒包希鲁《守城记》的佐证。

至正十一年,道童出任江西行省平章政事。<sup>②</sup>是年五月,以韩山童、刘福通为首的北方红巾军在颍州(安徽阜阳)起义。同年八月,在韩、刘的影响下,邹普胜等也正式举兵反元,他们推举徐寿辉为主,举红巾为号,攻破蕲水(今湖北浠水),进据黄州。<sup>③</sup>江西处于起义军的包围中,道童不懂军事,仓皇不知所措,在百般无奈之下,听从左右司郎中普颜不花的建议,起用抚州熟悉军事的退休官员章伯颜协助策划防御。至正十三年,南昌军民在道童、普颜不花和章伯颜等人的带领下击退来犯的红巾军,江西儒学副提举熊钊受命采辑守城官兵的事迹,当地名儒包希鲁为此撰述了《守城记》。此《记》引用《诗经》的语句赞颂道童等人的守城之功:“‘怀德维宁,宗子维城’。由平章公而下,非为国人,则为勋旧,国人有宗子之道,勋旧皆怀德之臣。故平章公能屈己以致章公,章公亦能克复厥志。若郎中公,则魁大对者也。其能结人心以为固者,由礼仪结于己之心也。”<sup>④</sup>“平章公”,指道童。“章公”,即通晓军事的章伯颜,此人姓章,蒙古名为伯颜(Bayan,“富裕”之意)。而“郎中公”,则指左右司郎中普颜不花。倘若包氏“由平章公而下,非为国人”的记述准确无误,也就是说除道童为“国人”(即蒙古人)外,其他两个人都不是“国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轻率地把具有汉姓加蒙古名的人视为蒙古人。元朝汉人显宦贺胜,蒙古名即为伯颜,类似的例证很多,兹不一一列举。经查,普颜不花,字希古,高昌氏,哈剌普华八世孙。至正五年右榜状元。<sup>⑤</sup>至正十一年,迁江西左右司郎中。蕲、黄徐寿辉来攻,希古战守之功为多。<sup>⑥</sup>如此看来,包希鲁关于“国人有宗子之道”以及“郎中公”(普颜不花)和“章公”(章伯颜)并非“国人”而是“勋旧怀德之臣”的记载应是有所本的。藉此,道童为蒙古人的论说再添强证。

然而不能回避的是,《去思碑》和《元史·道童传》的编撰者为何将道童的蒙古族属界定为高昌人?在阐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考察《去思碑》产生的背景和时间。从碑文内容看来,为道童树立去思碑的动议源于平江“岁凶”引发的诬枉事件。

据《宋学士文集》卷71《星吉公神道碑》记载,星吉(1296—1352)以元顺帝(后)至元二年

① 《后汉书》卷42《东平宪王苍》,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433页。

② 《新修南昌府志》卷15《名宦传·道童条》称“至元十一年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的表述不准确,应为至正十一年。

③ 《元史》卷42《顺帝纪五》,第892页。

④ 乾隆《南昌县志》卷55《艺文·记一》,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影印乾隆十六年刻本,《中国方志丛书》第813册,第2369页。

⑤ 沈仁国:《元朝进士集证》(下册),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60—465页。

⑥ 《元史》卷144《道童传》,第3442—3443页。

(1336)擢嘉议大夫太府卿。其时,“知昆山州事管某上书,诬平江路总管道童诡报岁灾。帝命公察情否。初,道童以廉正治,其属官不能堪,故诬之。且倚前翰林学士阿鲁恢为援。公验得其状,以闻。卒坐二人罪”。<sup>①</sup> 郑元祐《长洲县儒学记》亦载此事。<sup>②</sup>

据上引史料,道童遭遇属下管某与前翰林学士阿鲁恢(又名阿鲁威、阿鲁翬,字叔重,号东泉,蒙古人)诬陷之事发生在元顺帝至元二年至五年期间。元顺帝派近侍星吉与监察御史“乘传南下”纠察此案时,道童已出任江淮财赋总管府达鲁花赤。<sup>③</sup> 据正德《姑苏志》卷3《古今守令表》,道童在后至元二年以通议大夫到任,后改任江淮财赋都总管府达鲁花赤。<sup>④</sup> 据此,《去思碑》大致树立于后至元二年至五年之间,最迟不应晚于至正元年。是年,道童从江淮任上迁转大都路总管府达鲁花赤。<sup>⑤</sup> 台湾学者陈雯怡研究认为,去思碑一般为官员卸任后所建,传达了百姓对地方官的肯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取消了唐、宋必须事先申请并得到朝廷核准后方可立碑的规定,所以元人立德政碑或去思碑不再履行地方事先申请、朝廷核准等程序,官方对颂扬文字管制松弛,去思碑的立与否成为纯地方性事务,当地“耆老”或“士民”则是基层社会请碑的主要群体。<sup>⑥</sup> 若然,平江路“岁凶、诬枉”事件之后,三吴百姓感念道童的善政,特派专人前往宁国敦请汪泽民为道童书写去思碑也是情理中事。

必须指出的是,《去思碑》的碑文是依据三吴耆老事先拟就的书状写成的。即使此碑文的编纂者与道童是旧识故交,也未必特别留意道童的家世和族别,只能依照事先写好的书状润色而成。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许与元后期久居江南地区的蒙古、色目人族属意识渐趋淡化的现象有关。再者说,当时寓居江南的蒙古、色目人甚多,<sup>⑦</sup>若要久居当地的民众和耆老对外来侨居人户的先世和族属都了如指掌恐怕也不现实。基于此,《去思碑》的编撰者误将道童的蒙古族属记作高昌人也是有可能的。明初史官在编修《元史·道童传》时未能参据其他史料认真甄别,遂采摭其说。而晚出的洪武《苏州府志》、正德《姑苏志》和嘉靖《浙江通志》也相继因袭《去思碑》和《元史·道童传》的说法,误将道童记作高昌人。

类似情况同样见诸《侨吴集》所收录的《长洲县达鲁花赤元童君遗爱碑》(以下简称《遗爱碑》)。据虞集《平江路达鲁花赤黄头公墓碑铭》载,元童的先世为唐兀人,乃父黄头,又名黄世雄,世居濮州鄆城(今山东鄆城县),曾任平江海道都漕运万户,后以怀远大将军为郴州路达鲁花赤。黄头有九子,第三子名元童,承直郎、平江路长洲县达鲁花赤。<sup>⑧</sup> 虞集以上叙事是依据

① (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71《元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江西等处行中书省丞相追封咸王谥忠肃星吉公神道碑铭》,《四部丛刊》初编本,第511—513页。

② (元)郑元祐:《郑元祐集》卷9《长洲县儒学记》,第211—212页。

③ (元)郑元祐:《郑元祐集》卷11《前平江路总管道童公去思碑》,第265页;正德《姑苏志》卷40《宦迹四·道童条》,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④ 洪武《苏州府志》卷20《牧守题名·平江路总管》条称:“道童,通议大夫。(后)至元二年到,改除江淮财赋都总管府达鲁花赤……后至元四年到任。”据此可知,道童于后至元四年已调任江淮等处财赋总管府达鲁花赤(第802页)。又,正德《姑苏志》卷3《古今守令表》谓:“道童,通议大夫。至元二年到,改江淮财赋都总管府达鲁花赤。”据以上载籍,道童从后至元二到四年任平江路总管府总管。

⑤ 嘉靖《浙江通志》卷33《官师志·道童传》,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⑥ 陈雯怡:《从朝廷到地方——元代去思碑的盛行与应用场域的转移》,《台大历史学报》第54期,2014年12月。

⑦ 陈得芝:《从元代江南文化看民族融合与中华文明的多样性》,《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94—209页;潘清:《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融合》,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4页。

⑧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44《平江路达鲁花赤黄头公墓碑铭》,《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6册,第322—325页;洪武《苏州府志》卷26《人物·名宦》,第1073页。

黄头之和尚的追忆以及当地文人朱礼和陈德仁的述状写成的,足资信据。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遗爱碑》的作者竟将元童记作高昌人,<sup>①</sup>不知何据。当然,《遗爱碑》是否出自郑元祐之手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如此看来,元代江南士人把蒙古、色目人族属相混淆的现象绝非个案。

同上引方志相较,唯弘治《重修无锡县志》将道童的族属记作蒙古人,这或许与其依据的史料有关。至治元年(1321),道童在“州厅壁记”中题署自己为蒙古人,这无疑是判断其族属最直接的证据。《去思碑》则是士民表达对官员善政怀念与感激的一种载体,无论立碑者是出自真心地感戴怀念,或是为了私利的虚美、谄媚之举,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它毕竟是来自民间的产物,所述史事并非尽确无误,以上对道童族属的辨析就是显例。

#### 四、道童的汉学

本文所谓“汉学”,指汉人所特有,尤为士大夫所专擅的儒学、文学与艺术,也就是汉人“大传统”中的主要部分。<sup>②</sup> 异族熟谙汉学者不仅应通晓汉语,而且其汉文化水平超过一般汉族平民,可以说汉文化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若以此标准来衡量,道童无疑是潜心研习汉学并具有较高水准的蒙古儒臣。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对道童的书法成就略有论述。<sup>③</sup> 萧启庆在讨论蒙古族书法家的贡献时也提到道童和畏兀儿书法家沙刺班。<sup>④</sup>

如前所述,尽管道童出身于以军功名世的木华黎家族,但他本人“素不知兵事”,以研习儒家经史为荣耀。元末文人唐桂芳称:“至正初,天下极治,人才项背相望。大名昭焯如达兼善、赵子温、秦裕之兄弟、乌克孙翰卿(即乌古孙良桢——引者注)、道童公仅六人。石岩,则道童公号也。翰卿与予善,所以于诸公相知最深。”<sup>⑤</sup>

达兼善,即泰不华,原名达普化,字兼善,号白野,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蒙古汉学家。<sup>⑥</sup> 乌古孙良桢,字翰卿,《元史》有传,此人“资器绝人,好读书”,“有诗文奏议凡若干卷,藏于家”。<sup>⑦</sup> 唐桂芳之所以把以上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五位才俊与道童并列,说明他们都是崇尚儒学之人。道童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前人关注不多,值得研探。清人顾嗣立、席世臣编《元诗选癸集》收录一首道童的诗作,题为《送都元帅述律杰云南开阕》。诗云:“临歧莫惜酒杯干,万里征途半载间。大将手挥旌节重,豪酋胆落剑锋寒。木牛五月浮泸水,铁马三更过雪山。竹帛功名当努力,不须回首忆东丹。”<sup>⑧</sup> 杨镰主编的《全元诗》亦收此诗。尽管编者对道童的畏兀儿人族属持怀疑态度,因缺少确凿资料仍将其界定为“高昌人”,<sup>⑨</sup>不免有些遗憾。当时以同名诗题吟

① (元)郑元祐:《郑元祐集》卷11《长洲县达鲁花赤元童君遗爱碑》,第270—272页。

② 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00—101页。

③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5《美术篇·西域之中国书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④ 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蒙元史新研》,第184页。

⑤ (明)唐桂芳:《白云文稿》卷19《为善堂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5册,第660页。

⑥ 《元史》卷143《泰不华传》,第3426页;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蒙元史新研》,第133—134页。

⑦ 《元史》卷187《乌古孙良桢传》,第4287—4290页。

⑧ (清)顾嗣立、席世臣编:《元诗选癸集》(上册),第333页。

⑨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3册,第247页。

诵者还有苏天爵、靳荣、冯思温等人，<sup>①</sup>这些诗作分别辑自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是道童与友朋之间相互唱酬的作品。此外，许有壬也有《送述律存道师云南》的诗作。<sup>②</sup>存道，是述律杰（1283?—1356）的字，因述律在辽代本为后族，亦称肖（或“萧”）氏，故元人又称作“肖存道”或“述律存道”。据方龄贵研究，述律杰出任云南都元帅的时间大致在后至元六年，出使云南的时间在至正二年到至正三年之间。<sup>③</sup>若然，道童等人七言诗应作于此时，说明苏天爵、靳荣、冯思温、道童等都与述律杰有过相互交流和影响。

元方外诗人张雨（1283—1350）也有《书道童总管赠蔡霞外诗后》。<sup>④</sup>据此可知，道童的原诗题为《赠蔡霞外》。“蔡霞外”也是方外道人，这一点从沈梦麟的《赠别羽士蔡霞外》<sup>⑤</sup>诗可以得到证实。陈方《送蔡霞外》云：“不见道人今四载，疏狂犹似旧时多。自言曾到神仙宅，公亦须吟离别歌。”<sup>⑥</sup>张雨，字伯雨，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后来前往句曲（今江苏句容）开元宫追随真人王道衍修炼道行。作为方外之士和书画名家，他非常关注道童的诗作，说明两人在书学和诗词方面彼此倾慕、相互交流。后来，长期居住于淀山湖畔的元末画家李升以士人与蔡霞外交往的题材为依据绘成《淀山送别图》，图后附录交往者彼此唱和的诗作。李升在题记中称：“高士蔡霞外主席冲真，既同诸公为诗以送之，复作是图，以志岁月云。至正丙戌六月十又三日，升再题于元览方丈。”<sup>⑦</sup>根据题记的时间判断，道童等人赋诗在前，李升作画在后。后至元二年，道童出任江淮等处财赋总管府达鲁花赤，至正元年迁转大都达鲁花赤。从任职时间、地点和称衔来看，上引张雨诗题中的“道童总管”应是本文讨论的主人公。清人朱彝尊在《曝书亭集》卷54《跋李紫笈画卷》中称：“意当日，必有诸公赠言跋尾，惜为人割去。”<sup>⑧</sup>李紫笈，即李升。据题记和现存诗作，朱彝尊所言是可以信从的。

道童除了与蔡霞外交往交流，还向江南禅宗代表人物天如惟则“稽颡问道，执弟子礼弥恭”。<sup>⑨</sup>此外，他还和虞集、朱德润及周伯琦等元代名儒相互唱酬，交往密切。虞集在《石岩诗为道童总管作》中有曰：“江郡暮云留远树，湖阴积翠上春潮。”<sup>⑩</sup>此诗应是在道童担任平江路总管时写成。除擅长诗文，道童还工于书法。在信州路总管任上，他不仅给吴万里的“为善堂”题字，还在后至元二年为修葺一新的“范文正公祠堂”题写匾额。<sup>⑪</sup>

在一般官员和儒士眼中，道童还是一个重视教育、弘扬儒家文化的地方官。在平江路任职期间，他重视教化，倡导兴学。徽州路学教授陆德原捐资兴建甫里书院之事始终得到道童的支持与帮助。在陆德原看来，道童“公牧我民厚，完我民者无不至，今又将溥善教以渐涵之，公之德意厚矣。然则德原将何以答公意哉？惟罄竭心力，期于壮厚高弘与公德化同垂永久而已

①（清）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27页；（清）顾嗣立、席世臣编：《元诗选癸集》（上册），第326页；杨镰主编：《全元诗》第36册，第238页。

②（元）许有壬：《至正集》卷10《送述律存道师云南》，《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7册，第68页。

③方龄贵：《元述律杰事迹辑考》，《元史丛考》，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74页。

④（元）张雨：《张雨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页。

⑤杨镰主编：《全元诗》第55册，第43页。

⑥（元）顾瑛：《草堂雅集》卷5《送蔡霞外》，中书书局2008年版，第469页。

⑦张曦主编：《元画全集》卷2《淀山送别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177页。

⑧（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54《跋李紫笈画卷》，上海世界书局1937年版，第641页。

⑨（明）钱穀编：《吴都文粹续集》卷30《狮子林菩提正宗寺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页。

⑩参见王颀点校：《虞集全集》（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

⑪（明）钱穀编：《吴都文粹续集》卷3《范文正公祠堂记》，第49页。

耳”。<sup>①</sup>后来,陆德原“搜才简工”,终于在后至元三年八月建成书院。此外,他还鼎力支持新安人吴希颜重新修建“和靖书院”,声言“治不本于学,岂稽古崇德之谓哉?”<sup>②</sup>凡此种种,表明道童对儒家文化极为尊崇。

## 五、结 语

结合以上讨论,现在将本文所获致的若干结论简要复述如下:

第一,《元史》是明初汉人用汉文书写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元史》本传的编修者往往依据地方文人撰著的《神道碑》或《去思碑》作为基本史源。随着移居江南等地的蒙古、色目人逐渐融入汉地社会,他们未必刻意强调自身民族属性的特质和文化内涵,而汉地文人在与其长久的混居和交往交流中,对蒙古、色目人的族属和来源渐趋淡化,以至于在记述其先世和族属时往往按照自己的想象予以建构,难免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元史·道童传》的编撰者误将传主的蒙古族属记作高昌人就是显例。本文通过对道童族属以及历官等相关史实考察,意在提醒人们在研究元代蒙古、色目人等少数民族人物时,不仅要注重搜集史料,更要认真辨析史料,唯此才有可能使其先世史以及诸多细节的重构逐步接近历史的本真。

第二,《元史·道童传》的传主并非高昌人,而是蒙古名臣木华黎的后裔。《元史·道童传》参照了汪泽民的《去思碑》,而《去思碑》则依据平江耆老所持书状编写而成,或许该书状在叙述道童的族别和早期任职经历时就已经发生失忆现象,后来又几经传抄,道童就由蒙古人变成高昌人了。

第三,道童不仅汉学根底深厚,还以功臣世家子孙廉洁履职,造福一方。这在当时和后世都是值得称道的。道童与虞集、苏天爵、周伯琦、朱德润、唐桂芳等元代名儒多所交往,可谓已“士人化”或“儒化”。面对南方红巾军的步步紧逼,他毅然选择舍身殉国,以此表达对元朝政治认同的坚定意志。

〔责任编辑 贾 益〕

<sup>①</sup> (元)郑元祐:《郑元祐集》卷9《长洲县儒学记》,第212页。

<sup>②</sup> (元)郑元祐:《郑元祐集》卷9《重建和靖书院记》,第215页。